

新大众文艺 多彩新表达

27 黔漂文化

贵州村超

文艺评论

新大众文艺的贵州实践掠影

顾同林

新大众文艺成为当下一种现象级文艺思潮，自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与时代语境。陕西文学月刊《延河》于2024年7期刊出《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对新大众文艺作出具体表述，即“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加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颇为直观、形象、口语化。由此开端，新大众文艺不断得到社会认可，直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这让我们更有理由总结历史的经验。回望历届党和政府的文艺政策、方针，从政治维度一次次夯实了文艺与大众的紧密关系。进入新时代以来，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任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文艺便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成为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近两年，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与蓬勃发展，便是人民的文艺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突出表征，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注脚，并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大众文艺的产生与发展，除时间维度之外自然也离不开不同地域这一空间维度的文艺实践。在这一方面，贵州恰逢其时，走在第一方阵之中。4月，贵州省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行动方案（2026—2028年）》，通过25条有力举措支持新大众文艺的全方位发展。在行动方案中，明确指出：“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迅猛发展条件下，由人民大众依托数字媒介与互联网平台广泛参与文艺创作、传播和共享，充分表达和展现文艺才华，深度拓展传统文艺边界的新型文艺形态。”行动方案的出台，既是对贵州新大众文艺异军突起的及时指导与扶持，也是对贵州今后新大众文艺发展的引领与前瞻。譬如，近几年来贵州“村字号”文艺活动早已出圈，“村超”“村BA”“村T”等蜚声国内外；省会城市贵阳的路边音乐会、一直零门票、零门槛，累计举办数百场；爆款短视频《雪山救孤》《ENEMY》《侗寨天籁》等，播放流量数以千万计；很多来自贵州百姓大众的素人创作者在网络上十分活跃，群体规模大，像毕节博主晓凡凡、“老辈子文学”代表祝新雁等便是；贵州省网络作家协会成立几年来，聚集了一大批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可以说，贵州成为一个新大众文艺的强磁场，有力地聚焦大众的智慧。粗略归纳背后的原因，一是贵州大力实施“四大文化工程”，本土多元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得到挖掘与整理；二是贵州人民大众在文化自觉、自信上有积累，有传统，民族文化蕴藏大量幽默乐观因子，独具魅力；三是交通、算力、数字技术奋起直追，已赶超全国很多省份。总而言之，这些为贵州新大众文艺的春天创造了历史条件，也让新大众文艺的贵州实践赢得了历史的机遇。

新大众文艺在黔贵大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可能被一篇短文所涵盖。笔者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换一种思路，以典型案例加以说明论证。典型案例之一，可以以2025年11月在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首播、芒果TV同步播放的电视剧《乌蒙深处》为例。其新大众文艺的表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大众参与影视同频共振的概况，二是电视剧本身内容中新大众文艺的鲜明表现。电视剧《乌蒙深处》开播便“高开高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和短视频、抖音、微信公众号等网络空间里的热门话题。当时，笔者抄录了《贵州日报》2025年12月19日的一组数据，即根据CSM全国网数据，该剧累计收视规模7.8亿人次，CVB中国视听大数据收视率最高达28.3%，最高收视份额达12.52%。抖音话题播放量25亿次，全网热搜110个，口碑话题持续发酵。一部反映贵州乡村全面振兴的电视剧能引发大众参与共享，广为传播，原因之一是电视剧本身是大众文化

的重要载体，与广大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第二个层面是电视剧本身承载了鲜活的新大众文艺情节或基因，讲述的故事是“乌蒙三棵草”（三位剧中人物）的华丽转身，情节线之一是麻青蒿在城市创业后，回到家乡创办民宿，在乡村扎下根来，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对初恋对象袁月亮的追求。麻青蒿用手机、电脑等工具进行直播，他所拍短视频在网上火了起来。譬如第1集麻青蒿用手机拍摄月亮和老伴去山上采摘紫浆草的画面，凭借这段内容成为当地的流量达人；第9集麻青蒿、吴艾草等人用无人机追踪狩猎蜂蜜的场景，传上网后更是轰动。除此之外，另一个与新大众文艺结缘的主角是吴艾草，剧集多处涉及他外出学习制作网络直播技术，回到家乡后技术不断精进，最终成为直播职业工作者。短视频、网络直播成为吴艾草的致富手段，手机成为新农具，吴艾草成为一个典型的新大众文艺的传播者。由此可以看出，哪怕在悬崖村这样较为偏远、闭塞的

少数民族村寨，哪怕地处乌蒙深处，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语境中，也滋生着新大众文艺的肥沃土壤，产生了类似吴艾草、麻青蒿一样的新大众文艺群体，这难道不是新大众文艺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的生动写照吗？

第二个典型案例可以列举黔东南作家姚瑶予以剖析，其创作的转变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来自贵州省天柱县的姚瑶，他在文艺圈里给人最早的重要印象是一名有风格的抒情诗人。他从事诗歌创作较早，算得上是贵州诗坛走纯粹抒情化写作道路的传统型诗人。姚瑶的本职工作在电力部门，业余从事新诗写作，出版过《疼痛》《守望人间最小的村庄》《芦笙吹响的地方》等抒情诗集。后来

因为黔东南“村BA”“村超”成为一个个热度高的现象级文旅IP，他将目光从独语、私人话语中解放出来，转到火热的新大众文艺现场，来到球赛、讲解员、村民、志愿者、商贩、普通职工等大众中间，写出了报告文学集《“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此书获得了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23年度“中国好书”、贵州省2023—2024年度“黔版好书”等。在榕江“村超”火爆出圈3周年之际，他的长篇报告文学《村超》也正式面世。作为贵州乡村新大众文艺的见证者、拥抱者，他的这部书以报告、纪实书写的方式，解码“村超”千亿流量密码，将“村超”这一黔东南当地的草根足球赛事以文字方式呈献于世人面前。从一个抒情诗人转型为新大众文艺的书写者，他书写的“村字号”文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聚焦“写大众”这一主题。翻阅《村超》，总能想起姚瑶写作时走遍榕江田野村寨和赛场的身影，以及他以朴实的笔触记录大众喜怒哀乐的热情与勇气。全书呈现的30位普通百姓的鲜活故事，有血有肉，“人人都是主角”的新大众文艺创作思想则跃然纸上。

由个体到群体，由耳熟能详的作品到新大众文艺的汪洋大海，毫不夸张地说，贵州新大众文艺的多元实践是丰富、多彩而独特的。人民大众成为文艺的主人，他们不是被动接收的对象，亦不是文艺的观望者，而是深度介入了文艺的生产、传播的每个环节。正因为这样，大众的兴观怨构成了新大众文艺作品的内核，传统的文艺圈层被打破，边界变得更加宽泛，文艺创作与大众同频共振的特征更加明显。新大众文艺的贵州实践，正是文艺真正扎根民间、服务大众的鲜活印证。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村超”童歌会的共创实验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蔚

跨界共创结硕果

连续3年，由知名音乐人张超、玉镯儿率领团队倾注心血的童歌会，将一首首贴近童心、根植乡土的原创儿童歌推向大众。词作家玉镯儿形容这场跨越数年的文化接力：“在这场关于新大众文艺的实验中，作词人、作曲家、编曲家、小说家、诗人乃至导演，每个人都献出了自己‘最硬的一片鳞甲’。”从孩子们零散的信件素材到诗意的歌词，再到完整的旋律与镜头的表达，专业力量与新大众文艺群体热情相拥，最终在这片质朴的民间土壤上，生长出了既接地气又有生命力的文化果实。

童歌会的源头，要追溯到几年前，黔东南州从江县谷坪乡中心小学一群羞涩的女孩最初面对镜头时低头不语，直到尝试用写信的方式将心底的愿望化作一张张明信片寄出。这些稚嫩的笔触，成为了歌曲创作者的灵感源泉。作词人玉镯儿从信件中提炼诗意的，并坚持把作词署名权还给孩子；作曲家张超用音乐旋律让一首《大山的小孩》应运而生；摄影师陈晓龙记录下孩子们上学路上的点滴，并为她们制作了MV；作家肖勤用笔写下她们的故事《廖崩塔佩合唱团》；导演邵兵用镜头讲述她们成长故事的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上映。

一首歌、一本书、一场童歌会、一部电影……这条路走了好几年，如今这一系列作品在爱心的托举下裂变壮大。

跨越山海促交融

对于童歌会的发起人、著名音乐人张超而言，衡量一首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准不仅仅是播放量，更是大众的“翻唱率”与“二创力”。他主创的2024年央视春晚歌曲《上春山》被多次重新演绎，上海话、陕西话、河北话的版本在短视频平台竞相绽放。音乐走出了封闭的录音棚，飘荡在家庭的客厅、学校的课堂乃至乡间的田野。

在第三届童歌会上，贵州省榕江县县麻娘镇中心校飞越彩虹侗族童声合唱团与江苏省常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阳光少年合唱团共同演绎了2026年春晚歌曲《立春》。张超认为，像《立春》这样既能登上春晚舞台，又能被小朋友搬上汇演的歌曲，正是他想创作的。

“村超”童歌会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它的纯粹与文化公益属性。这种纯粹性也体现在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身上：文化馆免费提供场地与

设备，降低了创作的门槛；球场上令人动容的画面，是台下那群默默搬运板凳、搭建舞台的大朋友。“一大群大朋友在为一群小朋友的节日做服务。”张超说，这种纯粹是新大众文艺最质朴的底色。

作为连续3届童歌会的发起人之一，玉镯儿对这片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在她看来，童歌会是专业人士与新大众文艺群体双向奔赴的结晶。

以歌连心绘新篇

更重要的是，童歌会正逐步突破地域壁垒，推动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互动。童歌会第一年，只有来自贵州的孩子在这里歌唱；第二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孩子来了；第三年，来自河北、江苏、广东及贵州本土的12支合唱团在“村超”赛场一起歌唱。今年4月，由贵州音乐人张超、玉镯儿团队创作的“苏超”主题曲《热烈盛开》，被知名歌手周深在常州奥体中心唱响，点燃了全场。而在今年童歌会上，来自江苏常州的孩子们又将这首歌带到了“村超”球场现场。从贵州大山里的“村超”到江南水乡的“苏超”，体育成为了纽带，而文艺则完成了更多情感的交融。

江苏省常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黄晨在踏入榕江球场的那一刻经历了巨大的震撼。作为一名常年与城市孩子打交道的教育工作者，他熟悉那种场景——孩子们忙着赶作业、刷考卷。但在榕江，他看到了这里的教育似乎不“卷成绩”，而是“卷快乐”，也看到了孩子们的纯真与好奇。黄老师坦言，在这里看到的是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是普通人释放情绪的出口，更是健全人格不可或缺的一环。

曾参演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的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为“村超”赛场带来了动感十足的《千灯万户》，带队老师说：“我们隔着千山万水，但贵州‘村超’和阜平‘村超’、河北‘村超’是一家。”共创在这里达成共振，两地的孩子用同一种方式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实现了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掌声如雷鸣般从山谷间炸开。散场前，童歌会主持人说：“今晚的每一首歌，都是大山里的孩子最真诚的告白；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少年的梦想与希望！”现场观众在童歌会这个舞台上看到了新大众文艺的奔涌活力。

音乐人张超深入苗寨为山区苗族女童创作歌曲。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蔚 摄

盛夏，贵州“童声里的中国”活动热潮涌动。6月底，从省级层面精心筛选入围央视展播的佳作开始以各种形式在多个平台进行展播。

近年，贵州童歌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以玉镯儿、张超等为代表的本土音乐人扎根基层，将大山里孩子们的心声和民族风情融入创作。以20个贵州苗族女孩作词的《大山的小孩》为代表，一批贵州原创童歌走向全国，还成功孵化出跨界的共创硕果。

今年“六一”儿童节，贵州榕江，“村超”球场再次被孩子们的歌声点燃。“大山的小孩·我们的节日”第三届村超童歌会如约而至。

来自河北、江苏、广东及贵州本土的12支合唱团、数百名少年儿童在绿茵场上并肩而立，齐声歌唱。这是一次关于新大众文艺扎根乡土、跨界生长的生动实践与共创。

贵阳路边音乐会。王兴峰 摄（影像贵州）

